

今年是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敝刊將於6月號刊出專輯，探討這位對人類歷史發展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人物的思想遺產，敬希讀者垂注。

——編者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中國改革進入「合題」階段

如何理解中國改革四十年的歷程，已成為學界爭論的話題。就此而言，朱嘉明的〈中國改革：一個趨於複雜的長期歷史運動〉一文（《二十一世紀》2018年2月號）是難得的持平之論。他放下當年的改革推動者角色，從觀察者角度來闡述影響中國改革歷程的國內外複雜因素。「複雜性」成為作者闡述中國改革的關鍵詞。

在作者看來，中國改革的起點很簡單，即改革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但是，改革所借助的思想資源以及改革主體的立場複雜多樣，引發了利益分化及諸多社會效應，從而導致複雜化。經過四十年之後，中國改革已超越了當年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我們現在已經難以簡單地把中國改革目標界定為「要政府還是要市場」、「公有還是私有」、「要經濟增長還是要分配公平」。實際上，中國改革不得不在這三組兩難關係中尋求合理的平衡。

作者的論述似乎隱含着一個「三段論」的歷史分析框架。1978年以前，中國政治經濟改革主要目標是建構一個以公平為基本價值、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我們可以把

它當作「正題」。計劃經濟的嚴重弊端導致1978年的改革開放，目標是建立一個以「效率優先」、承認私有財產的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反題」。然而，市場化改革帶來了社會不平等、「權貴資本主義」等問題。因此，中國政府開始對改革目標進行一系列的修正。這樣，改革逐漸進入複雜的「合題」階段：既要政府干預也要市場機制、既要經濟增長也要兼顧分配公平。政府與市場、公有與私有等要素日益糾纏一起。

剛結束的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有數十個「新提法」、「新舉措」。其中，大多數是針對市場化改革弊端而提出來的。例如，對「主要社會矛盾」重新界定以應對市場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增加了「美麗中國」目標來糾正環境污染換取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這些新舉措都可以視為「合題」階段的探索。

然而，我們很難判斷這些新舉措是否合理，其結果也難以預測。進入「合題」階段的中國改革，會遭遇更複雜、激烈的紛爭。計劃經濟與市場化改革的弊端都已經展現出來。左右兩翼都能找到支持其觀點的論據以及社會力量。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如何平衡前面提到

的兩難關係，在左右兩翼的夾擊之間走出一條改革的「中國道路」，將是它不得不面對的嚴峻挑戰。

文明超 廣州

2018.2.15

中美蘇三邊互動的新探究

1969年中蘇邊境接連爆發的多場武裝衝突，不僅讓雙方積怨加深，而且使中國改變了「反帝」與「反修」並重的外交政策。以中蘇兵戎相見為機遇，美國方面通過或明或暗的方式向中方傳遞或明或暗的經意願。經過共同努力，中美高層逐漸建立起了直通管道，最終形成中美蘇角逐的新態勢。代兵、張碧坤〈1969年：中美蘇戰略大三角形成的起點〉（《二十一世紀》2018年2月號）一文運用新資料，圍繞中美蘇三邊互動問題展開了論述。

文章以2006年解密的《美國對外關係文件》（FRUS）中國卷（1969-1972）為重要史源，分析了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政府對華政策的決策過程，指出美方對中蘇進行權衡後，修改原先將中國視作「最好鬥的一個」的判斷，認為在

198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的黃金年代

制衡蘇聯的意義上中國具有全球戰略價值。為了實現聯合對蘇的目的，美中之間的其他事務皆處於從屬地位。是故，尼克松政府決定嘗試主動恢復雙方接觸管道，以為後續改善關係奠定基礎。

面對可能出現中美關係趨近的前景，蘇聯方面有何舉措？從文章引用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 (Anatoly F. Dobrynin) 與基辛格 (Henry A. Kissinger) 會談的記錄可看出，多勃雷寧非常在意美方是否會介入中蘇衝突，急於了解白宮對華政策新動向。多勃雷寧這種「摸底」應是奉莫斯科之意而為。蘇聯高層此時在中蘇關係上存有強硬派和溫和派。由於1960年代後期以降的蘇聯檔案解密數量有限，目前尚不清楚這兩派如何協調觀點差異，從而形成彼此都可接受的因應中美關係演化的策略。

同樣源於中文公開檔案的缺乏，文章對北京推動中美交往時的運思，尤其是顧慮因素着墨不多。不過從基辛格訪華後，中方迅速告知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至少可看出，北京估計發展對美關係會導致盟友的猜疑甚至不滿，需要安撫。至於中蘇關係，如文章所言，中方1969年8月已作蘇聯入侵在即的最壞打算，由此展開了實質性備戰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為了防範蘇聯入侵，軍委辦事組下達了有名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它觸發最高統帥將憂慮從「邦外」延續到早已暗潮洶湧的「講牆之內」，也為之後的中樞鉅變埋下伏筆。

黃駿 南京
2018.2.26

自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來，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官方宣揚意識形態、建構政權合法性的有力工具。徐勇的〈198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選本與文學場域的建構〉（《二十一世紀》2018年2月號）一文，通過梳理1978至1989年間的文學年選、獲獎作品集，以及思潮流派選本等幾種主要選本類型，指出1980年代的文學選本是在「新時期共識」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知識份子和廣大讀者三方面密切合作的產物。

作者首先討論《建國以來短篇小說》的開創性意義，在於創造了十七年文學和1970、80年代轉型期文學的並置形態，為建構轉型期文學的合法性提供了有效的策略。隨後在1980年代初期關於外國現代派作品的編選，則反映出對1980年代文學「新質」的探索，當中耐人尋味的是《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多了前言、後記部分，作者認為這樣的「指導」是為了借用合法性話語對現代派加以闡釋，成為有效且可行、穩妥而易於被接受的策略選擇。不過選本作為一個開放性的文本，會由於讀者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理解與接受，文學觀念正是在這當中發生着潛移默化的改變。

此外，在198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很多事情只要通過討論和爭鳴，就可以甚至必定能夠產生一個共識，因此當時出現了爭鳴作品選，作者認為如此的「眾聲喧嘩」成為了文學健康發展、文學的主體性不斷提

升，以及文學批評空間不斷擴展所共同構成的文學場域逐漸建立的過程。然而作者也指出，儘管1980年代文學有其自由展開的空間，但並不意味着主流意識形態毫無作為。相反，它透過以文學評獎為核心的獎勵引導機制這樣一種更為隱蔽有效的權力「規訓」，從而建構出新的文學秩序。同時，這套規範巧妙地借用了廣大群眾意志，通過精心設計使得獲獎作品由群眾所選，專家評議，層層選拔出來，從而創造了一種主流意識形態、廣大群眾和知識界「親密合作」的形式，因此文學評獎也成為了主流意識建構新時期文學秩序的有效機制。

最後，作者討論了文學年選、年鑒的大量出版，則是以對文學盛況及時記錄的方式參與新時期文學格局的正面建構。不過這樣的編選也傾向於保守，強調的是宣揚健康向上和愛國主義精神，因此包括先鋒和實驗性質作品，以及大部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作品/作家在這當中的缺席也就不足為奇。同時，當時影響較大的知青作家/作品的入選次數也不多，說明主流意識形態也並未完全接納這批作家。

1980年代作為中國大陸文學的黃金年代，當中的文學選本編纂具有較為複雜的構成，既有廣大群眾和知識份子的參與，也有主流意識形態的介入，對於新時期意識形態的建構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楊森 廣州
2018.2.20